

讀必部幹

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

(卷 上)

解 放 社 編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 讀 必 部 幹 •

列寧斯大林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

(卷 上)

解 放 社 編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目次

一、準備和實施十月革命的時期

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列寧三——四二

（一）飢荒迫近

（二）政府之毫無作為

（三）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四）銀行國有

（五）新繼加國有

（六）取消營業秘密

（七）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八）調節消費

（九）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十）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十一）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十二）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十三）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列寧四三——四四

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列寧四五——四七

一、準備和實施十月革命的時期

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

(一) 飢荒逼近

必至的災禍逼臨到俄國頭上。鐵路運輸紊亂不堪，而且日益加劇，勢將完全停頓。供給工廠的原料和煤炭的運輸行將停止。糧食運輸快要中斷。資本家故意加緊對生產怠工（損壞，停閉，搗毀和阻礙生產），指望以空前的災禍來使共和國和民主制度，蘇維埃和一般工農團體陷於破產，來促進帝制復辟和恢復資產階級地主的專政。

空前大規模的災禍和飢荒勢所不免地逼臨到頭上了。這在所有一切報紙上都已千番百次地說過。各政黨，各工兵農蘇維埃所通過的不可勝數的決議案也都承認，災禍難免，並已逼近眼前，必須拚命設法防止，人民必須『英勇努力』來挽救滅亡等等。

這一點是大家都談論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承認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決定了的。可是絲毫的辦法也沒有採取。

革命已有半年，災禍逼臨得更近。大批工人失業。只要想想：國內百貨俱空，國家在有充裕糧食和豐裕原料的情形下，竟因食品缺乏和工力缺乏而感受着滅亡危險，——可是在這樣的國家中，在這樣危急的時機，竟造成了大批失業現象！這個事實顯然證明在革命（有些人稱之為大革命，可

是暫時也許稱之爲腐朽的革命要比較公正些）半年中，既有民主共和制度，又有許許多多傲然自稱爲『革命民主』團體、組織和機關的情形下，實際上真是沒有採取絲毫認真防止災禍，防止飢荒的辦法。我們之臨近破產，愈來愈速，因爲戰爭是不等待的，而它所造成之民衆生活各方面的紊亂狀態也就日益加劇起來。

其實只要稍微加以注意，稍微思索一下，便足可相信，防止災禍和飢荒的辦法是有的，這種辦法是十分明顯簡單，是完全可以實現，是民衆力量完全能够做到的；其所以不採取這些辦法，只是因爲，惟一·是因爲實行這些辦法，就會觸犯一小羣地主資本家底駭人利潤。

真的，可以担保說，在任何一个演說中，任何一个派別的報紙上任何一篇文章中，任何一个會議或機關底任何一个決議案中，沒有不十分明白肯定地承認那防止災禍與飢荒的基本主要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統計和調節，規定生產中勞動力的正確分配和食品的正確分配，愛惜民力，消除對民力的任何浪費，一一加以節省。監督、監察、統計——這就是防止災禍和飢荒的首要辦法。這是不容爭辯而爲衆所公認的。這也正是人們所不作的，其所以不作，是因爲害怕觸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觸犯他們用抬高物價和供給軍需品（而現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間接爲戰爭『工作』）所獲得的空前巨大、駭人聽聞的利潤，這種利潤是衆所共知，衆所共見，衆所驚駭喟嘆的。

而國家方面竟沒有採取絲毫辦法來實行多少認真的監督、統計和監察。

（二）政府之毫無作為

全國各處對國家施行的任何監督、監察、統計，以及調整這些辦法的任何嘗試，都實行經常一

實的怠工。只有幼稚到了極點的人才不懂得，只有雙倍虛偽的人才能假裝不懂：這種怠工是從何處發端，並用何種手段進行的。因為這種由銀行家和資本家實行的怠工，他們這種破壞任何監督、監察、統計的舉動，都適應着民主共和政體，適應着『革命民主』機關底存在。資本家老爺們完全明白領會了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本是一切贊成科學社會主義者都在口頭上承認的，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其友人一攀上總長次長等高位之後，就立刻把它忘掉了。這個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政體來代替君主政體是分毫也不觸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經濟本質的，因而反過來說，只須把那保護資本主義利潤之神聖不可侵犯權的鬭爭方式加以改變，就可以如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一樣，來在民主共和政體下順利保持這種權利。

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對任何監督、統計、監察實行怠工的現代的最新手段，就是資本家在口頭上『熱烈』承認監督『原則』及其必要（所有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然也是一樣），不過主張這種監督的施行應是『逐漸的』，按部就班的，『由國家調節的』。其實這種好聽的詞句祇是用來掩蓋對監督的破壞，把它化為烏有，變為空中樓閣，掩蓋那以監督為兒戲而把任何切實認真的步驟擱延不行，建立各種非常複雜龐大，毫無生氣的官僚監督機關，這些機關全以資本家底意志為轉移，絲毫無所作爲，而且不能有所作爲。

爲了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們且從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找出幾個證人來，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正是在革命頭半年內在蘇維埃中佔有多數，參加過『聯合政府』，因此他們對於庇護資本家的政策，對於資本家破壞任何監督的行爲，都要在政治上對俄國工業負責的。

在『革命』民主派所謂『全權』（莫開玩笑！）機關中的最高機關之正式機關刊物中央執委（即全俄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發行的第一

百六十四期上，登載有關於監督問題的專門機關底決議，這個專門機關也是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建立，並在他們把持之下。這個專門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在它的決議上正式承認，『政府所設調節經濟生活的中央機關毫無作爲』，至係事實。

難道證明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政策破產的證據，有比他們親手簽字的這個文件更好的麼？還在沙皇制度時代，就已承認有調節經濟生活之必要，並已建立了一些負此責任的機關。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經濟破壞狀況繼續增高，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革命共和政府底任務，本是要一開始就採取嚴重堅決辦法來消除這種破壞現象。當有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組成時，在五月六日發表的昭告國人的鄭重宣言中，曾約許負責施行國家監督和調節辦法。那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以及一切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們賭咒發誓，說他們不只對政府行動負責，而且他們所掌握的『革命民主全權機關』也在切實監視並檢查政府底工作。

從五月六日以後已經過去四個月了，在這長漫漫的四個月中，俄國因舉行帝國主義的荒謬『進攻』而葬送了幾十萬兵士，經濟破壞和災禍飛速地逼近起來，況且夏季時無論在水運方面，農業方面以及調查礦藏等等事業方面，都有作出許多成績的極大可能，——而過了四個月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認說：政府所設監督機關『毫無作爲』！！

這班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儼然以國家要人的態度，在現時（我作此論文時，恰當九月十二日民主會議^①的前夜）高談什麼只要與工商業界的啓特·啓對奇輩^②即梁布申斯基，布伯力科夫，特勒青科之流成立聯合政府來代替那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便可挽救時局呀！

試問何以解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種可驚的盲目病呢？難道他們是些因極端愚鈍幼稚而不知道所作何事，自甘迷誤的政治嬰孩麼？或者是他們佔據總長、次長、督撫、政治專員等等高位

過多的事實，才必然產生一種特殊的『政治上』的盲目病變？

(三)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可能發生一個問題，也許監督方法和辦法是一種極端複雜、困難、未經試驗、甚至是人所不知的事情吧？其所以久延未行，也許是因為立憲民主黨中，工商業者階級中以及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的國家要人雖已汗流浹背、勞累半載來探求、研究、發現實行監督的辦法和方法，但是這個任務過於困難，所以仍未解決吧？

真可嘆惜！竟有人把事情說成這樣，來努力蒙混不識字和不開通的愚昧農夫以及那些輕信人言而毫不留心考查的庸夫俗子。其實甚至沙皇政府，甚至『舊制度』，在建立軍事工業委員會時就已知道實行監督的基本辦法，主要方法和手段：使居民按各種職業，工作目的，勞動部門等聯合起來。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聯合，所以極力設法限制，故意排斥這種衆所共知，輕而易舉，全可施行的監督方法與手段。

一切交戰國家受到戰爭所造成的極端嚴重的困苦災難時，或多或少地受到經濟破壞和飢荒時，早已擬定，決定，採用，並已再三實驗過許多多的監督辦法，所有這些辦法，幾乎總是歸結於把居民聯合起來，歸結於在有國家代表參加之下，在國家監察之下等等來建立或獎勵建立各種各類的團體。所有這些監督辦法都是衆所共知，千番百次地說過寫過了的，各先進的交戰國所頒佈的關於監督的法律也已經譯成俄文，或在俄國報章雜誌上詳細記載過了。

假使我們的國家真想切實認真實行監督，假使它的機關不是因獻媚資本家而自陷於『毫無作爲』的地步，那末國家只須一舉手之勞就可以從現有的無數監督辦法中找到已經知道，已經施行過的辦

法。這裏的唯一障礙，即爲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向民衆隱瞞了的障礙，始終是因爲實行監督就會暴露資本家底駭人利潤，就會損害這些利潤。

爲了把這一最重要的問題（實質上就是關於任何一個願意挽救俄國，使其擺脫戰爭和飢荒的真正革命政府底政綱問題）解釋得更加明顯起見，且把這些最主要的監督辦法列舉出來，而逐一加以考查。

我們會看見，政府如果不只是以革命民主的稱號來引人發笑，那它只須在其成立的最初一星期中，頒佈實施最主要監督辦法的法令，規定認真而嚴重的懲罰辦法來處分那些用欺騙手段迴避監督的資本家，並號召人民自己來監視資本家，監視他們是否誠實執行關於監督的法令，——這就足能使監督制早已在俄國實現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監督辦法：

（一）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由國家監督它的營業，或實行銀行國有。

（二）把各個新迪加，即資本家底最大壟斷公司（糖業，煤油業，煤業，冶金業等等的新迪加）收歸國有。

（三）取消營業秘密。

（四）強迫工業主，商人以及一般企業主新迪加化（即是強迫他們合併爲各種組合）。

（五）強迫人民聯合於各種消費協社中，或獎勵這種聯合並監督之。

且來把這些辦法逐一加以考查，看看在用革命民主手段來實行的條件下究有何種意義。

(四) 銀行國有

大家知道，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底中心，全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系統底神經中樞。談「調節經濟生活」而避開銀行國有的問題，這就無異是暴露自己絕頂愚昧無知，或者就是以華麗詞句和漂亮的約許來欺騙『老百姓』，而預先立意不執行這種約許。

監督並調節糧食底運載，或者監督並調節一般產品底生產和分配，若不監督和不調節銀行營業，便是荒謬可笑。這好像是捉取偶然賺得的『幾個哥比』，而不理會那成百萬盧布的橫財。現代銀行已與商業（糧食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不『干預』銀行，便絕對不能作出絲毫認真，絲毫『革命民主』的事情。

然而，也許這種由國家『操縱』銀行的事情是一種非常困難複雜的手續吧？人們通常都是努力以這種情景來恐嚇庸夫俗子，而努力這樣作的，當然是資本家及其衛士，因為這是對於他們有利的。

其實，銀行國有絕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絕對沒有任何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困難，而僅僅是被極少一些富人底卑污貪慾底利益所阻撓。銀行國有其所以常常被人與沒收私人財產混為一談，是由於那些利於欺騙民衆的資產階級報紙故意散佈這種混淆概念所造成的結果。

銀行所操縱的那些集中於銀行裏的資本所有權，是有印刷的和書面的字據為之證明的，這些字據就叫做股票，債券，期票，收條等等。在施行銀行國有時，即是把所有一切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時，這些字據一個也不會作廢，一個也不會改變。誰按儲蓄券擁有十五個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他仍舊是十五盧布的所有者，誰擁有一千五百萬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也仍然享有由股票，債

券，期票，貨物證等等所表現的一千五百萬盧布。

，那末銀行國有的意義究竟何在呢？

就在於對各單個銀行及其營業，是任何真正監督（即令取消了營業秘密等等）都無法實行的，因為無法察覺在編製決算時，在建立空牌企業和分行時，在使用冒名人等等時所採取的一切極複雜，極紛繁，極狡猾的手段。只有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這種合併的本身絲毫也不改變私有財產關係，重說一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任何一個哥比，——才可能實行真正的監督，當然要在施行上述其他各種辦法的條件之下。只有實行銀行國有，才可以使國家知道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盧布往來流通的處所，以及這種流通是怎樣發生和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只有監督銀行，監督這個資本主義流通過程底中樞及其主要軸心和基本機構，才可以不僅口說，而且真正辦好監督全部經濟生活，監督重要產品生產和分配事宜，才可以辦好『調節經濟生活』的事情，否則，這種事情必然始終會是閣部欺騙老百姓的空話。只有在把各個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的條件下，實行監督銀行營業，加上施行往後那些容易實現的辦法，才可以辦好真正徵收所得稅，不致有隱瞞財產和收入的事情，至於現在的所謂所得稅，則大半是空中樓閣而已。

· 實行銀行國有，只要下道命令，就可以使銀行經理和職員自己來執行。並不需要由國家方面設立任何特殊機關，採取任何特殊準備步驟，這個辦法正是用一道命令，『一舉手』就可以實現的。因為既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債券等等的程度，那它就恰巧造成了實行這種辦法的經濟上的可能性。這裏剩下的事情只有統一簿記而已；如果革命民主國家決議立刻用電報通知，在每個城市中召集銀行經理職員的會議，在每省和全國範圍內召集他們的代表大會，以便立刻把各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那末這一改良在幾星期內就可以辦好。自然正是那些經理和高級職員將要

設法抵抗，極力欺騙國家，故意擱延等等，因為這班老爺們會喪失他們收入特別優裕的位置，會喪失其獲利特別豐厚的欺詐營業的可能；全部實質就在於此。可是合併銀行的事情，並不會有絲毫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國家政權不只在口頭上是革命的（即是不害怕打破一切因循慣習），不只在口頭上是民主的（即是保護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不是一小羣富人底利益），那末只須發佈一道命令，以沒收財產和監禁來懲治那些稍敢延擱和企圖隱瞞文據、賬目的銀行經理，董事和大股東；只須舉例說，把貧窮職員單獨組織起來，並對於凡是揭發富人方面底欺騙和擱延行為者均給以獎金，就可以極順利極迅速地將銀行國有事業實行起來。

銀行國有對於全體人民，特別是對於農民和小工業者大眾，而不是特別對於工人（因為工人很少與銀行有來往），是會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勞動力方面的節省會是不可計算的，假定國家保存銀行原有職員數量，那末，這就會是向普遍利用銀行方面，向廣泛增加分行數目，擴大銀行營業大眾化方面等的莫大進步。正是對於小業主，對於農民說來，信貸之大眾化及簡易化，將大大增長起來。而國家方面就第一次有可能起初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營業，而不會有任何隱匿，其次就監督這種營業，然後就調節經濟生活，最後就獲得幾百萬以至幾千萬萬的巨款來進行巨大的國家設施，並不要因所謂『中介』而付給資本家老爺們巨大的『酬勞』金。正是，而且只是因為如此，所以一切資本公司，一切資產階級教授，整個資產階級，以及所有替它服務的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涎沫直噴地拚命力爭，反對銀行國有，臆造出無數遁詞來反對這個最容易而最迫切的辦法，其實甚至從『國防』觀點，即是從軍事觀點來看，這個辦法也有莫大的優點，它可以大大提高國家底『軍事實力』。

這裏也許會有人反駁說：那末，何以如像德美這樣先進國家實行了極好的『調節經濟生活』辦

法，而沒有想實行銀行國有呢？

我們回答說：這是因為這些國家雖有君主民主之別，可是兩者都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而且是帝國主義的。它們既然是這樣的國家，所以在實行其所必須的改革時，就採用反動官僚的方法，而我們在這裏說的，則是革命民主的方法。

這個『小小的差別』確有極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差別常常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這個名詞在我國（特別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那裏），幾乎成了一句通常套話，如像『謝謝上帝』一語，就是那些並非愚昧無知得相信上帝的人也常說的，又如像『可敬的公民』一語，有時甚至用來稱呼那些在畫報或統一報上的撰稿人，雖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可猜到這些報紙是由資本家爲了資本家本身利益而創辦而維持的，因而所謂社會主義者之參加這些報紙，本來是少有『可敬』的地方。

若是不把『革命民主』這個名詞當作鋪張的詞句，當作流行套語來用，而思考它的意義，那末要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就要真正顧及大多數民衆底利益，而不是少數人底利益；要做一個革命者，就要最堅決最無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過時的東西。

據我們所聽見的，無論在美國或德國，無論是政府或統治階級，都不覬覦『革命民主』這個稱號，而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却覬覦這個稱號（其實是侮辱這個稱號）。在德國一共只有四個有全國意義的私人大銀行，在美國只有兩個：這些銀行中的財政大王覺得在實行聯合方面較爲容易，較爲方便，較爲有利的，是用私下、秘密、反動手段，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是用官僚手段，而不是用民主手段，這樣就可以收買官吏（這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成了通例），保存銀行底私有性質，而這正是爲了保持營業秘密，正是爲了從國家方面榨取千百萬『額外利潤』，正是爲了保

障能在財政方面來幹種種欺詐把戲。

無論美國或德國，其『調節經濟生活』的方式都是給工人（和一部份農民）造成軍事苦工營，給銀行主和資本家造成天堂。這些國家的調節辦法就在於使工人『緊張』到挨餓地步，而（用秘密、反動官僚手段）保障資本家獲得比戰前還高的利潤。

這樣的方式，在共和制帝國主義的俄國也完全可能；而這一方式也就不僅由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輩實現着，並且也由克倫斯基協同特勒青科，涅克拉索夫，伯爾納茨基，普羅科波維奇之流實行着，後面這班人也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掩蓋銀行之『不可侵犯性』，及其獲得駭人利潤的神聖權利。不如說句真話吧：人們是想在共和制度的俄國用反動官僚的方式來調節經濟生活，可是由於有『蘇維埃』存在，『常常』難於實行，第一個科爾尼洛夫曾想驅散蘇維埃而沒有成功，可是第二個科爾尼洛夫又會努力設法驅散它的：

這才是真話。這個雖很苦辣，却是簡單的真話，對於啓迪民衆方面，要比說什麼『我們的』，『偉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好聽的騙語有益得多：

★

★

★

銀行國有，就會大大促進同時實現保險事業的國有，既是把一切保險公司合併爲一，集中它們的活動，由國家加以監督。在這裏，保險公司職員代表大會，也可以把這種合併立刻實施而不會有何種困難，只要革命民主國家下令這樣辦，並嚴令各保險公司底各個經理和大股東務須負責毫不遲延地實行這種合併就行了。資本家投在保險事業方面的資金有幾萬萬，全部工作都是由職員進行的。把這一事業合併起來，就可以減低保險費，使一切保險者獲得極大的便利，並減輕他們的負擔，可以在原有人力和資金的條件下擴大這種業務底範圍。除了極少一些收入豐裕者的因循慣習和

私利目的以外，決沒有任何其他的情況阻礙這種改良，加之這種改良又能提高『國防力』，節省國民勞動，展開許多有極嚴重意義的真正『調節經濟生活』的可能，而不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五) 新迪加國有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前的舊國民經濟體系的區別，就在於它造成了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密切聯繫與相互依賴。要是沒有這一點的話，則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都會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的。由銀行統治生產的現代資本主義，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這種互相依賴性引伸到了極點。銀行和各大工商業部門已緊密結合而不可分離了。這在一方面就是說，不實行由國家壟斷工商業新迪加（糖業，煤業，鐵業，煤油業等新迪加）的步驟，不把這些新迪加收歸國有，而單把銀行收歸國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這就是說，要認真實行調節經濟生活，就須同時把銀行和新迪加一概收歸國有。且拿糖業新迪加來作例證吧。這個新迪加還在沙皇時代即建立起來，那時就已將許多設備極好的工廠合併為一個極大的資本主義組合，這種合併自然全是按照最反動的官僚方式實行的，它保障資本家獲取駭人聽聞的利潤，而使工人和職員處於絕對無權，卑賤，萎靡，奴隸的地位。那時國家就已實行監督並調節生產，以便使財閥和富豪獲得利益。

這裏要做的事情，只是頒佈一個召集職員、工程師、經理、股東底代表大會，實行統一會計，由工會實行監督等等的簡單命令，來把反動官僚的調節變為革命民主的調節而已。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然而正是這件事情至今還沒有實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事實上仍保留着按反動官僚方式對製糖工業的調節，一切都仍舊：濫費國民勞動，因循守舊，讓波布林斯基和特勒青科輩大發其財。要號召民主派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官僚，要號召工人和職員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